
中国的文明负担

——对民主化的影响——

郑永年

(ZHENG Yongnian,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文明与民主

在中国研究中，大多学者都会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能否加入世界民主俱乐部？中国能否发展出民主政治，不仅具有内部影响，而且具有巨大无比的外在性，势必对亚洲及其整个世界事务产生影响。在最近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在亚洲转型成为民主，唯独中国还是个例外。中国逃避了 Fukuyama 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也逃过了 Huntington 所说的“第三波”。

在有关中国民主的讨论中，中国文明和现代民主的可容性一直是个关键。正像西方民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民主实践和理念，中国的非民主是否也和中国久远的文明传统有关呢？中国民主的追求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每当他们没有能够挑战现存非民主的政权时，就转向了攻击中国文明。1920年代的“五四运动”是一例，1980年代的“黄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之争也是一例。这种争论在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就没有中止过。九十年代初，Huntington 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文章，立即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Huntington 认为日本和韩国能够成为民主是因为这些国家和中国有不一样的文明。但是日本和韩国一直被视为是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加入了民主俱乐部，中国还在外面呢？

很多中国学者及其政治人物对中国文明很有信心。那些看到了亚洲“四小龙”高速经济发展成就和儒家文明之间关联的人尤其如此，他们相信一个儒家复兴的时代就会到来。保守的中国政治人物乐见其成并且对此加以褒扬。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衰落，儒家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甚至有人妄想创造出一个儒家民主的概念，即从儒家传统那里寻找现代民主的成分。这可能很幼稚，但的确很多人正在这样努力。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感到中国的文明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加入民主俱乐部的阻力。这在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身上表现得很清楚。李慎之一直被视为是当代自由派的代表。李慎之非常乐意看到新加坡的李光耀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批评儒家传统。之前，李光耀一直致力于推动儒家精神。李慎之相信李光耀的这一转变有助于人们对儒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中国的文明负担在哪里？

当学者们乐此不疲地用科学的指标如人均 GDP、中产阶级的大小、教育水平等来解释民主时，他们忘记了文明可以被政治利用从而成为民主化的负担。中国的文明负担在哪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日本、韩国文明和中国文明。不管有怎样的分歧，这样一个共识在学者们中间是存在的，即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儒家文明圈。在近代，当儒家文明在中国遭受到各种外来主义攻击的时候，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日韩，儒家文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到今天，很多儒家传统在中国已经消失了或者在消失了很久以后正在重新捡回来，但在日韩等国这些传统保存得相当完整。为什么儒家在这些国家并没有成为民主化的阻力，而在中国本身成为了阻力了呢？

日、韩的民主化和中国的非民主的关键并不在于 Huntington 所说的这些国家之间发展出了不同的文明，而在于这些国家处于儒家文明圈的不同位置。简单地说，中国处于儒家文明的中心，而其他亚洲国家处于不同的边缘地带。用一个比喻来说，中国文明犹如一个球状的有机体，而其他亚洲国家文明则象一个千层饼那样的复合体。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中国文明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地锁 (land-locked) 文明，中国对外在世界的变化不够敏感，回应外在世界的变化非常慢。外在世界对中国文明有影响，但很难改变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为了生存，中国文明必须对社会经济的环境变迁作出反应，但反应必须缓慢，以便保护自身的本质。这就是近代以来人们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就是说，中国文明不见得拒绝外来的影响，但在接受这样那样的影响的时候，必须加以内在化，而不至于改变文明的根本。

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一种新的文明很容易被加于旧的文明之上。在这些国家，儒家本来就是进口来的，是用来对付当时来自中国的挑战。再者，这些国家大多是海洋国家，他们都必须对外在的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否则他们的生存就要受到挑战。当一层新的文明加于旧文明之上时，新、旧文明并不见得发生冲突。在日本、韩国和后来的台湾，都是这样，可说是一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现象，和中国本身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民主的挑战来临时，日韩接受民主作为他们的政体的主体。民主的实践在日韩并没有视为有害于现存的文明；相反，他们把民主接受成为新一层的文明。这当然并不是说，接受新文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阻力，而是说，他们不会为了保护从中国进口来的文明而拒绝接受另一种新文明。当他们把新文明叠在旧文明之上后，就把民主作为进行政治活动的主构架。但是，旧式的政治实践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在民主的大构架之下。人们可以从今天日、韩、台湾民主政治表象背后看到旧式政治。

在中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除了旧文明本身对新文明的抵抗之外，政治上的阻力更是强大。西方文明首先被视为是对中国本土文明的一种威胁。本土文明自然不愿意让一种外来文明来影响自己和渗透到自己的本体。当压力足够大的时候，中国本土文明会对外来文明做出调整甚至容纳外来文明的一些因素，但这种调整和容纳必须不是强加的。

不过要强调的是，中国本土文明并没有阻止民主政治扩散到中国，是政治因素真正阻碍

民主的扩散。文明也是一种政治领域。一旦涉及到政治，中国文明被认为是具有自己的使命。每当挑战来临之时，各种政治势力起来宣称自己是中国文明的保护者。很显然，用保护文明的名义来追求和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是一种非常方便、有用和有效的政治方法，也是政治权力的重要资源。在这里，文明的阻力和政治阻力合二为一，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合二为一。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抵抗在所有儒家文化圈里是最强大的。

文明与政治

文明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贯穿在近代中国历史。当政治力量没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来应付现代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就转向了文明，希望过去的东西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希望过去的东西能够解决现在的合法性。

当西方文明挑战中国文明的时候，中国的精英分子并没有全盘拒绝西方文明。在19世纪末，他们开始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当时他们认识到，现代化建设应当以军事建设为优先。这不是他们自愿的选择，而是时势所迫。当时西方国家奉行的是帝国主义，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国家是不受尊敬的。但是中日战争中中国的失败证明光有军事现代化是不够的。政治改革或许更为重要。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改革。当各种改革失败了以后，就有了革命。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总体说来，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的精英人物学习西方的过程。孙中山本人建立的中华民国及其提倡的“三民主义”都是以西方民主政治原则为基础的。只有当孙中山发现民主原则不能运作以后，才转向当时的俄国。直到蒋介石的北伐战争后，中国才出现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构架。无疑这个现代国家是参照列宁主义国家原则建立的。

但这个现代国家的构架的基础并不牢固。蒋介石就企图从中国文明中寻找政治资源。于是就有所谓“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有三个目标：1、用本土的儒家意识形态取代当时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2、培养各地政治力量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及其服从、国民党内各派对蒋介石本人的忠诚及其服从；3、用儒家学说来整合当时正在崛起的各色各样的社会力量。蒋介石发动这样一个运动，当然也有蒋本人相信儒家的原因，但是可以看出，儒家在这里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

共产党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以后，儒家的命运是众人所知的。毛泽东对待儒家比几个世纪前的秦始皇帝有过之而不及。但即使这样，毛泽东最终还是要偷偷地从后门求助于儒家来帮助他的统治。这就是所谓学习雷锋运动的根源。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专制决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危机（“大饥荒”）。党内要求集体决策和民主的呼声开始出现。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受到相当的动摇。很显然，毛泽东倾心于雷锋是因为雷锋对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的党具有无私的和无限的忠诚。这种精神是传统儒家精神。可以说，学习雷锋运动是一次变相的儒家复兴运动。当然，学习雷锋运动也加入了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的小传统，那就是“阶级斗争”。

改革开放运动把中国推向了经济资本主义，但并没有结束文明为政治服务的传统。人们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会把中国推向民主政治。但现实是，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准备接受民主政治作为现代政治活动的基础。相反，他们转向了传统。九十年代末以来的所谓“德治”运动就是当代的“新生活运动”或者“学习雷锋运动”。为什么要提倡“德治”？自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否认过要搞民主，无论是党内民主也好，社会民主也好，甚至是宪政民主也好。但是，权力人物从来就没有真正准备实行民主改革。但是没有民主很多问题就很难解决，如遏制腐败、法治建设、政府合法性、执政党的转型等等。于是就转向了“德治”。没有人会否认儒家传统中“德治”的重要性，但是在当代的背景下提倡“德治”很显然就是为了强调对执政党的忠诚、对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忠诚。

当文明成为政治的时候

作为一种非常成熟的价值体系，儒家并不见得一定要依附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权。在中国本土，儒家已经在不同的政权下生存了下来，几千年的封建皇朝、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在海外，儒家更是在民主政体下得到很好的生存。尽管中国文明对外界变化的反应很慢，但它是有能力作出反应的。在过去的数千年里面，中国文明已经发生了巨变。尽管从儒家那里寻找现代民主的因子会是一种徒劳，但也没有任何理由证明中国文明和现代民主不能相容。

真正重要的是文明的政治。当文明成为一种政治资源的时候，民主就很难渗透到中国文明中去。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建设一个新型国家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也在学习西方，但他们始终用利用方便的传统来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自利，也是因为他们面临的文明的制约。如果他们不去利用丰富的文明资源，他们的“敌人”就会利用文明资源来对付他们。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个文明国 (civilizational state)。今天，文明仍然在中国政治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以复兴传统为目标，领导层仍然向过去寻找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只要人们还是面向过去，而不是未来，文明就会继续成为民主政治的阻力。当然，文明只是一个替罪羔羊。